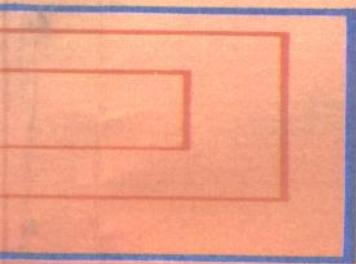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
科 研 办 公 室



论编辑 和编辑学



中國書籍出版社

论编辑和编辑学

中國書籍出版社

论 编 辑 和 编 辑 学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编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42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

统一书号： ISBN 7-5068-0044-6/G·25

定价： 5.00元

目 录

当前出版研究的三个课题(代序).....	边春光(1)
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	戴文葆(10)
何谓编辑.....	刘光裕(20)
编辑——大文化体系的组织者和更新者.....	何满子(28)
图书编辑工作的本质、规律及有关问题.....	林穗芳(31)
对社会主义编辑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 和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	遇衍滨(40)
编辑的“学”与“术”.....	王振铎(50)
研究编辑劳动 揭示编辑规律.....	邵益文(58)
编辑工作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孙五川 林 呐(67)
图书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	阙道隆(73)
试论编辑学的规律性.....	郑津舟 谭金崇(84)
试谈编辑学的一般规律.....	康秉礼(92)
论编辑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	韩晓明(100)
关于编辑实践的若干规律性问题	胡光清(117)
试论编辑过程规律	陈仲雍(127)
图书编辑学规律初探	冯国祥(139)
多民族文字出版社总编辑工作的特殊规律	张业汉(147)
论编辑活动的共性与个性	杨 扬(152)
什么不是和什么是编辑规律	徐柏容(168)

有关编辑学的几个问题	周文熙(179)
编辑学是一门边缘科学	潘宇鹏 蒋慧姝(186)
当前编辑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吴世灯(196)
建立图书编辑学刍议	孙培镜(202)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编辑学 需要研究些什么?	蔡克难(211)
论图书生产经济规律的特殊性	陈景春(220)
论编辑的素质	陈志强(234)
试论编辑劳动的创造性	刘胜毅(243)
试论编辑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	李荣生(253)
编辑在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山曰比(266)
论编辑审稿中的政治思想把关	姜照远(273)
注重文化积累 求新求精求实	王世义(283)
编辑审美初探	张永东(288)
略谈开展编辑史的专题研究	申 非(294)
后记	(305)

当前出版研究的三个课题（代序）

边春光

在当前的出版改革中，我想了三个出版研究的课题。

一、关于出版价值和出版价值的取向

图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具有传播文化和积累文化的功能。要求人们从文化的价值上来考虑出版工作的质量，确立出版工作的价值观。因此，文化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取向，在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是应该讨论清楚的一个课题。

大家知道，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商品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和发展的，它要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又要以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作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两者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文化出版不能注定产生商品化倾向，但是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倾向会冲击文化事业，甚至会把文化事业拉向背离社会效益的轨道。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文化价值的取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确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才能引导文化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文化价值包括思想价值（即理想、信仰和精神境界）、智能价值（即分析批判能力、鉴赏能力和知识技能）、审美价值（即审美敏感和审美能力，辨别美丑和创造美）、愉悦价值（即供欣赏、消遣、调节精神和情绪、开发智力、利于身心健康）。由于

文化价值构成的复杂性和社会文化需求的多样性，给评判文化价值带来了困难。因为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价值，它具有双重特性，既有精神价值，又有经济价值。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决定了不同的文化价值的评判标准。因此，同一种文化产品，同一种文化现象，站在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评价。不同的评价，又决定着人们对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是发展还是限制？是保护还是取缔？这种从不同角度出发产生的不同评价和态度，大多数情况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素养和文化需求。有时也反映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和工具，文化是人类进步的标记，文化手段在人类生活中常常显示出巨大的渗透性、持续性、稳定性。文化手段包括舆论、道德、民俗、信仰等等，其作用是无所不至的。文化的力量往往可以超越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文化素养、文化环境，会使人们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比如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社会秩序混乱，虽然采用了不少行政手段，但犯罪率、犯错率仍然不能下降，就和采用具有长效的文化手段不够有关。

文化不是终极价值，衡量文化价值的唯一尺度只能是社会生产力。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中介，文化不是生产力本身，只能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中去，实现其价值转换，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建立起保证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因此，提高人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会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会直接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会提高人们辨别美丑的能力和创造生活美的积极性。

图书是文化的载体，它的思想价值包括了伦理、道德、认识、启迪的价值。在思想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上，如果偏重于经济价值，为了赚钱，去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不择手段地去出版低级庸俗甚至是色情淫秽的书刊，采取这种图书的价值取向，就违背了文化出版正确的价值追求。

图书具备智能价值，它包括知识、科学技术价值。在智能价值与功利价值的选择上，如果偏重于功利价值，急功近利，只去出版那些一般的生活图书、娱乐读物、消遣作品以及各种拼凑起来的所谓工具书，就会降低书籍应该具有的智能价值。

图书有审美价值。在审美价值与愉悦价值的选择上，如果偏重于愉悦价值，就不能培养读者对现实世界以及整个文化艺术的鉴赏和创造性。审美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和培养人们对现实世界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鉴赏和创造能力，陶冶人们高尚、积极的情操，在思想上得到健康成长，成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优美情操的人。美育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建设两个文明都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谈到民间艺术的作用时说过：“民间故事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它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通俗文学如果能达到恩格斯所说的民间艺术的作用，我们应当极力地去发展它；反之，如果把那些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庸俗读物大力推向民间，就很难起到上述作用。

实现图书的社会价值，要有正确的引导。不能轻视引导的作用，不能放弃引导的责任。要坚持政策引导，坚持计划引导，坚持价格引导，坚持知识引导。图书是一种社会文化工具，它对社会进步产生直接的影响，它的价值取向是受社会制度制约的，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必然会造成严重倾斜。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通过党和国家的政策，限制一些不合理的价值取向，如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的取向。图书价格体系不完善和存在不合理因素，是造成图书价值取向不合理的重要原因。有些价值不高的书，能得到经济实惠；有些有价值的书，却得不到实惠。这就驱使许多人涌向有经济实惠但不一定价值很高的图书的出版，造成出书上的畸形状态。这就要求我们用经济手段去进行调节，用经济补偿的办法去鼓励出版有价值的书，用课以重税的

办法去限制那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书的出版。图书出版发行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与人们文化素质有关，要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促使价值取向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必须进行艰苦细致的知识引导，从而不断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逐步提高审美能力、思想水平、知识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接受高层次的文化科学知识。计划管理、计划引导要反映文化出版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文化价值取向的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如果没有计划管理，没有宏观控制，就会使正常的出版发生倾斜。而计划引导，在一定的意义上，带有强制性。

二、关于出版社的性质和办好 出版社的基本条件

提出这样一个老问题来进行研究，是因为当今在一些出版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商品化倾向，实际上把出版物的经济效益放在了首位，偏离了文化出版价值的取向。

这些年新建了不少出版社。这些出版社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还不很完善；有些出版社则在新形势下对出版社的性质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认为应当改出版社的文化事业性质为文化企业。

出版社是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阵地，它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持。经济是出版社的物质保障。但是，作为思想观念的交汇和记载信息、传播知识的出版业，无论如何不能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反转过来，把出版社传播文化科学的职能改变为以盈利为目的。

要充分实现出版社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价值，要办好出版社，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条件呢？

1. 要有明确的方针

党的出版方针是明确的，但是，在贯彻党的出版方针中，常常碰到像出版自由，像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如何处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关系，出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等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出版方针的贯彻。

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也是繁荣科学文化的条件。但是，它如同任何自由一样，都不是绝对的，都要有个界限，不能超出四项基本原则和宪法所允许的范围。

出版工作不能不讲求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一切从金钱出发，出书都以是否盈利为转移，那么，许多书特别是一些学术著作，就都得不到出版。因此，出书既不能不讲经济效益，又不能像商品经济那样只讲经济效益。因此，我们研究出书问题，既要从文化的共性出发，更要着重研究出版工作的特殊性。一部电影，如果只有几百人几千人看，那就很难发挥它的效用；但一部专业书可能只有几百人看，但它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很大，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如果我们硬要要求任何图书都像电影一样拥有众多的观众，那许多书只好不出了。电影制片厂可以作为文化企业，但出版社能不能作为文化企业，文化事业与文化企业有什么区别，把事业改为企业之后对它的要求与事业有什么不同，都需要研究清楚，这是一个性质问题，也是一个方针政策问题，不能带有任何随意性。

2. 要有符合出版社要求和从实际出发的出书结构

出书结构不应当只从一个年度去看，而要着眼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比如三年五年，至少要反映出出书结构的一个框架。在这个结构的框架中，应当有“骨干工程”，有“一般工程”，有“配套设施”，以形成一个阵势，不能是过了几年，出了不少书，回头一看，所出书籍仍然有点杂乱无章，仍然处于无秩序状态。我觉得，总编辑如果任期五年，那他在这五年之内总得形成一个反映他在任期间所经营的一个出书规格和出书规模。因此他平时应当以相当的精力用在研究出书结构和出书规模的形成上。

3. 要有近期的和长远的规划

现在有的同志对出书规划不重视，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只有近虑没有远谋。有的同志觉得定了规划不能完全实现，定不定都一样。还有的同志规划定了，但缺乏实现规划的措施。

规划还是应当有的。制定规划要建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向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们作调查。因为这些人有学问，对各门学科发展的趋势比较了解。出版社有了规划，也可启发和推动著作界进行创作。因此，规划对办好出版特别重要，它可以使出版社进行有计划的出书，它可以促使出书质量的提高，它可以使出书保持合理的结构。

4. 要有有影响的重点书

一家出版社在读者中有没有影响，有没有信誉，决定的条件是有没有出版好书。读者一般并不关心一家出版社的出书数量，不会从出书的数量上去衡量一家出版社成绩的大小。重点书的作用在于：可以促进出书质量的提高，可以积累提高出书质量的经验，可以培养提高干部和出人才。所以，出版社一定要有重点书的出书计划，舍得在重点书上花力气。

5. 要团结一批作者

出版社要有一支基本的作者队伍。出版社要了解作者，要同作者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彼此交心。不能把同作者的关系看成单纯的约稿关系。外国出版社有组稿编辑、加工编辑，组稿编辑有较高的学识、经验和活动能力，他有敏锐的眼光和判断能力，能团结作者和帮助作者，作者愿意把书稿交给他。这样出书质量就比较有保证，出书领域也会不断拓展。

6. 要有有决策能力的总编辑

总编辑的主要职责应当是把握方针，决策选题，审读书稿，监督质量。这就要求总编辑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学识条件以外，最重要的要了解情况，熟悉情况，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善

于把握时机，善于发现苗头，在情况弄清之后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贻误时机。

7. 要有优化组合的编辑队伍

编辑队伍走优化组合的路子势在必行。队伍要精干，要齐心协力，要职权明确，要有目标责任制，在各自的环节上把工作力求做好，这样才能出人才、出成果。要建立考评制度，敢于奖励先进，有突出贡献的要重奖，这种做法恐怕比承包制要优越。我觉得组织编辑队伍最重要的还是事业心和献身精神。我们不能轻视物质鼓励，但更不能轻视精神力量。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也就没有精神支柱，这样要使一支队伍有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困难的。

8. 要有经常的图书评论

图书评论不仅是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更不只是发表那种推荐性文章。图书评论是一种学术活动，对图书所阐述的观点的评价，对图书结构的评价，对逻辑文字表述的评价，编纂工作经验的总结交流等，都应包括在图书评论之内。图书评论是培养提高干部的有效方法。如果天天忙于发稿，不注意总结编辑工作经验，那就丧失了提高编辑水平的时机，这恐怕是有些编辑干部反映提高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关于开拓广阔的流通渠

道和保持良好的流通秩序

图书征订萎缩，读者时常抱怨买不到所需要的书，仍然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1988年纸张价格不断上涨，现在书价也上涨了不少，却不能与纸张和其他印刷材料同步增长。如果书价放开，完全按成本定价，购书最多的知识界是难以承受的；书价不放开，出版社又难以承担过大的亏损，这就造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现在书店进货的总码洋并未减少，而且帐面上还在增长，但册数除

教科书以外，因书价上涨而减少。书店资金匮乏，也是流通领域的需要与可能产生尖锐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书店为了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或者说为了生存，要开展多种经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从方向上来说是正确的，也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但是多种经营挤占图书发行的资金、仓库和门市在一些地方已有发生，实际上削弱了图书发行。

这些矛盾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是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反映，恐怕不是短时期可以完全理顺的。但是书价尽管上涨，许多书仍然供不应求，这就需要不断研究读者心理、读者需要，根据图书市场的变化调整出书计划，不能用“一厢情愿”的办法来出书和销售图书了。但是读者的爱好又不完全是合理的，有些畅销书也并不是因为有文化价值而畅销，这是一种矛盾现象。

现在图书市场有一种新的趋势需要注意，不像以前那样，上面号召学什么，什么书发行量就大。而是读者需要什么书就买什么书，对什么书有兴趣就买什么书。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出版社出书面要拓宽，书店进货品种要增加，更需要开架售书，使读者任意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书。

这几年相当多的个体户赚钱很多，但他们买严肃图书的人极少，出高价买消闲书的人越来越多。怎样引导消费也很值得研究。可以作点调查，出点适应这个层次的通俗读物，有选择地出点消遣书，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在潜移默化方面发挥作用。面对这些读者的书要能引人入胜。有些书可以印得精美一点，相应地提高一点书价。

流通秩序还要扩展，要增加批发网点，要主动推销，要善于推销，不能坐店待客。

流通秩序要整顿。要保护和调动主渠道的积极性，出版社不要与新华书店争利，恐怕还要让点利。出版社自办发行要搞，怎样搞得适当？怎样运用经销寄销这种购销形式？都要总结经验。新

华书店提出竞争条件要平等，发行品种、发行折扣、发行时间要一致，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有的出版社畅销书自己发，而大量的品种包括不大好销的书则交新华书店发，据调查，有的出版社自办发行本版图书10%左右的品种所得利润同交新华书店发行的90%左右的品种所得的利润相当，这不符合平等竞争的要求。

基层书店要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卖书是主业，不能削弱。这方面要有章法。

不能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从事发行工作的同志要有献身精神，要表彰那些热爱图书发行工作并做出成绩的先进人物。

图书市场的管理要加强，要建立行业公会性质的组织，对图书市场进行协调管理势在必行。个体书商不能搞批发，批发业务应当掌握在国营书店和领导力量较强的集体书店手里。管住书源才能真正解决书摊书贩的经营方向问题。图书市场的流通和管理是一门学问，是出版研究的又一个课题。

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

戴文葆

国际间研究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学者们，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连续不断；历史文化中的内在因素，在现代生活中仍有重大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审视与估价，在西方学者中间早已展开讨论。德国学者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将人类文化区别为若干独立的实体，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秘鲁、中美洲及西欧文明，还有近东文明，各自成为主要的单元。他指出，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不存在可将其包容在内的更大的实体。其后，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把迄今以来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二十一个社会，继而增改为二十三个，后来他在《再思考》中列举十三个大文明和十五个卫星文明。他认为其中的六个，即古代埃及、苏末、米诺斯、马雅、安第斯及古代中国文明，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而其它的文明，包括希腊社会等，都是这六个社会的“后辈”。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最早出现的六个社会中，苏末、米诺斯、马雅、安第斯文明，早已从地球上消失，只留下一些建筑遗迹和珍贵文物，而近代埃及文明已非古代文明的继续。他强调称，自远古以来的一切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的寒暑风雨，纵令王朝更迭交替，得以维持其文明性格的一贯性的，唯有中国文化。汤因比说这是令人惊诧的历史现象。

面对着学者们高度评价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我感到需要检视两个层面：其一，何以能比较稳定地持续不断；

其二，这种内在的稳定性对于当前现代化事业有何影响。前者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编辑工作的重大意义，回答论坛给我出的题目；后者则从思想文化领域中观察文化传统自身的价值，从事编辑工作者应有一个自觉的认识，以便注意克服旧思想的梗阻，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在论坛给予的时间内，我的说明将以前者为主，而只简略地涉及后者。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学者们有所论述，只是语焉不详，大致揭示的原因不外是：封闭的地理环境，西有葱岭大漠，东临沧海汪洋；单一的田园经济，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和内聚力；来源为多元、多维度的，经长时期融合而成多民族的集合体，还论及其它如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等，都曾对中国文化的连续与稳定产生作用。所有这类研究，我以为，都疏于考察文化自身含有的力量。文化并非是一种抽象，它是完全真实的，存在于特定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的行为与成就之中。尽管文化不完全像一般自然物体同样方式的真实（因为它还具有精神形态），在考察中国文化时，不能忽略大量的连续的历史文化典籍书卷的存在。这些书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的化身形态，而这些书籍的编辑工作的辛劳的存在，不因王朝走马灯式的更迭而全然中断，则是维系和促进中国文化的连续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文化的令人惊诧的持续性，是编辑工作重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我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这次论坛指定我发言的题目上来。现在应该继续展开我的答卷。人类的文明进步，从哪里反映出来呢？从古代文献，重要典籍，古老而优美的文物，传世的艺术品，以及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交往礼仪与风俗习惯等等，都反映了文明进步的程度，各个社会对世界的贡献；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图书，图书构成了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智慧的结晶，任何创造发明最终都将写在书籍里。中国、埃及、巴比伦、希腊、波斯、罗马、印度等都是文明古国，她们在思想、文化和科学上对人类社会

的贡献，首先和主要的都记录在图书中，当然，还有古代文明的遗址，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和人们很容易忽视的各式各样日用生活器物中。最古的文献，最初的书籍，之所以能够集成和保存下来，正是靠着最初的编辑工作。编辑和编辑工作，是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随着纸张的发明和改进，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书籍就愈来愈成为文明的主要传播工具，从中世纪到现代都是如此。现代传播文明的工具，在书籍之外，报纸，期刊，声频（广播）、视频（电视），以及各种有声读物（磁带），出版物的种类和形式愈来愈丰富，编辑工作在学术文化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愈来愈大，编辑的职能和地位日益重要了。有图书，有各类出版物，就一定要有编辑。出版物都应该经过编辑之手，由编辑进行内容上和技术上的处理，而后与广大读者（听众、观众）见面。古往今来，尽管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编辑工作的广度与深度有异，已有无数没有留下姓名和许多著名的编辑为文化学术的发展而工作着。

关于编辑工作的重大意义，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察，在远古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表现出来。在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的城子崖，出土的大量古文化遗物中，有十六块都带钻痕的卜骨，当时可能已有一种叫做“巫”的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距今五千多年的龙山文化，与我国远古国家起源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一批管理国家军政、经济事务和从事宗教文化活动的人。这些人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文化知识，成为古代贵族国家的文化官和专业文化人。最初的编辑，或者比较确切地说，最初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就是古代国家的巫师（卜筮官）、史官和乐师。其中史官负责记言记事，也掌管占卜吉凶，在古老的卜筮术《周易》中往往史巫并称，他们是古代国家政务官、事务官之外的宗教文化官。

中国的古代史一般上溯到三代，即夏、商、周三朝。《史记·夏本纪》所记夏帝世系，至今还未得到地下文物的证实，但龙